

中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的挑战与创新^{*}

□施建军 夏传信 赵青霞 卢 林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取得了新成效,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通”,需要在借鉴成功的国际开放型经济体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延展开放布局、创新开放路径、整合开放资源,有层次有步骤地创新开放格局。

关键词: 开放型经济 经济全球化 全球价值链 虚拟经济

一、引言

开放型经济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坚持新常态发展理念,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2017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827122亿元,比上年增长6.9%,继美国之后,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左右。中国已经步入开放型经济时代,开放型经济成为中国发展的新模式和新引擎,开放型经济对于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和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 Lucas, 2009)。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①中更是提出,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更广阔的视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划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全方位高层次推进对外开放进程,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影响”。开放型经济强调把国内经济和全球市场联系起来,尽可能充分地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没有能量交换的封闭系统不可能改变系统的旧貌,将使系统的不平衡加剧,最终导致系统混乱乃至消亡,新系统平衡与健康发展需要系统的开放,能够不断与外部进行能量交换。开放型经济国家即是一个开放系统,是由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引发财富的双向流动,这需要政府、企业、个人的全方位多元化开放。发展中国家只有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制定正确的开放型发展战略,在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寻找发展机会,才能最终实现强国富民之梦,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更应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

二、开放型经济:全球市场、虚拟经济与网络革命的一体化融合、协同发展

开放型经济是与封闭型经济相对立,是一种经济发展新体制模式(宋泓,2015)。开放型经济下,以促进外部经济发展为主,鼓励出口,生产要素、商品与服务可以自由地进行跨国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11&ZD004)、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专项委托项目(批准号:17JZDW10)的阶段性成果。文责自负。夏传信为本文通讯作者。

流动。开放型经济=全球市场+虚拟经济+网络革命。广义的全球市场不仅包括一般商品买卖活动的运动空间,还包括与对外贸易有关的货币结算、货物运输、货物保险等内容,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国际化、资源国际化、生产要素国际化、生产国际化、物流国际化、科技国际化及服务国际化。全球市场的形成使一国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全球性开放范畴,在国际化的系统内实现平衡。虚拟经济是一个新生词语,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主要指证券、股票等,最为普遍的是成思危给出的定义(成思危,1999,2001)。虚拟经济是指虚拟资本以网络系统为依托,金融系统为载体,不断交替融合、周而复始的经济活动。具体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房地产业、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及诸如担保、对冲基金、证券、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等,是一个涵盖金融业的概念。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经济日益呈现出“虚拟五化”趋势,即经济金融化、财富金融化、金融全球化、金融证券化和危机经常化。网络革命也是开放型经济的重大表现。大数据时代,网络革命正在爆发,网络物流快速发展,以B2B、B2C和C2C为模式的电子商务发展如火如荼,物流产业革命初见端倪,信息流推动物流,物流信息化蓬勃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和物流经济的发展正在逐渐改变传统贸易方式。跨国公司越来越重视使用线上外贸平台进行采购,国际采购方式已经逐渐向在线方式转变,倾向于小单多频与定制化,当前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实现的贸易量已经接近国际贸易量的10%。在经济全球化、知识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开放型经济日益体现为全球市场、虚拟经济及网络革命的融合,从而使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开放型经济是全球市场、虚拟经济、网络革命三者的有机组合、一体化融合,互为支撑、协同发展。

开放型经济是多元化的经济,绝不是少数国家单边化的经济,开放型经济是本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生态系统中的良性互动与健康融合,它既不同于外向型经济,也不是简单开放与被动接受。在开放型经济中,进出口并重、分不清也不分主次地位,市场主导、政府不干预,完全竞争要素市场,关键在于发挥比较优势,属于优势决定理论。同时,对内对外投资受要素和政策影响小。随着全球范围内要素、商品与服务的流动性加强,全球经济的融合度与依赖度也提高,使得开放带来的输入型风险机会增加。因此,开放型经济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它在促进本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融合的同时,又能在共同制定全球经济发展战略和风险防御机制时掌握一定话语权,建立与本国开放经济相配套的风险防御体系和健康循环机制,面对爆发性国际金融危机,不仅能够“止血”、“输血”,而且具备自我“造血功能”,使开放型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剂强心剂(蔡昉,2011),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三、后危机时代开放经济模式面临的挑战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开放型经济达到了新水平,经济总量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其中货物出口额居世界第一位。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开放型经济和全球化红利,但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愈加凸显,全球经济进入了经济低速增长、高失业率、对外贸易持续低迷的“新常态”过渡时期,传统开放经济模式面临瓶颈。

(一)全球价值链规律凸显,经济活动的国际竞争方式发生变化

全球价值链是贸易投资、服务、生产的一种综合体,所有生产要素本身及其周边产生的一系列价值、利益分配以及要素再生产等各链条的增值。同时,历史、文化和经济基础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国家整体的全球价值链层次,企业在本产业中的竞争能力差异,决定了其在全球价值链的等级。我国传统发展模式下的各种政府干预政策,不利于增强企业在全价值链分工中的竞争力。我们特别不能忽视新技术、商业模式和组织方式的迅速变革。新技术的典型代表为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产品、智能制造等;商业模式变革如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组织方式变革则包括外包、生产的一体化等。面对新的技术、商业模式和组织方式,要求我国企业、产业和政府进一步吸收新变化,才能使我国生产和贸易活动进入价值链高附加值端。

(二)贸易保护主义升级,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

当前全球贸易环境中,以关税壁垒为主要特点的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和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特点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并行,已经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构成冲击,贸易摩擦进入多发期。我国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经济发展面临较强的外部风险。在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发达国家除了坚持对传统产业的保护,还扩大到新兴服务业、金融业、高技术产业以及知识产权等优势领域。与

此同时,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多地运用其国内立法和行政干预手段,手段更趋多样化。尤其是美国逐步加大对本国制造业的扶植,加大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的规模,不仅给当前我国出口依赖大、内需不振的现状带来了较大危机,而且使以组织和法律为基础的WTO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产业分工遭到破坏。

(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竞争加剧

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资金和劳动力、储备丰富的自然资源,曾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但随着我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各类要素成本进入集中上升期,同时,环境、劳工权益保障、安全等规制成本上升,使得低成本制造的传统优势受到削弱,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视角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进来,跨国公司不断地在全球开拓新兴市场、分散投资风险,实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降低成本,为了占有全球市场,国际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移开始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发展经济体转移(如越南、印度和菲律宾)。成本更低的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载体,中国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的潜在竞争。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生产要素成本优势明显,在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方面竞争力增强。

(四)国内结构调整、动能转换加快,传统开放经济面临“倒逼压力”

当前阶段,全球经济疲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我国传统开放型经济增长“乏力”,对外贸易增长近年增速变缓,未达到预期增长目标(全毅,2018)。在外需持续低迷、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动力转换加快等多重因素“倒逼压力”下,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着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迫切需求,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高收入国家的劳动者技术成熟,更容易带来长期增长效应,低收入国家的劳动者具有工资方面的优势,也容易带来高的长期增长,然而中等收入国家,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工资优势,又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竞争技术优势,因此容易陷入“比较优势真空”或“产业断档”风险,即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蔡昉、王美艳,2014;程文、张建华,2018)。目前我国正处在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构建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体制,以开放促发展,加快动能转换成为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新的比较优势是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五)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得我国开放型经济的整体格局受制于“木桶效应”

近年来,尽管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超过了东部地区,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仍较明显。开放型经济追求的是均衡、全面、因地制宜地开放,如何使我国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的中西部地区获得真正的发展并从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获益,将直接关系到我国收入差距问题和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的解决。我国地广人多,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催生了产业结构的多样性和区域经济的复杂性,这是一把双刃剑,有效开启中西部地区的开放模式,将大大增强我国在抵御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中的韧度。

四、着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开放型经济进行了准确、精辟的论述,高屋建瓴的提出了“五通”等一系列对外开放战略,如何切实落实既定目标,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新格局轮廓初现。

(一)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构建东中西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双向延伸、沿海沿边内陆相呼应的开放格局

1. 扩展沿海经济圈,打造开放新高地。东部沿海地区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东部地区国土面积不足全国的六分之一,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四成,人均土地面积少,人口密度高,2018年,东部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为11494.1亿美元^②,其中:出口额为6224.9亿美元,进口额为5269.2亿美元,分别占全国的79.8%,80.4%和79.1%。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逐渐放缓。在全球市场疲软、产能过剩、能源紧缺、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东部地区应主动嵌入“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格局,将长三角经济带、珠三角经济带、环渤海经济带、京津冀城市群、雄安新区,打造成为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国际化城市群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为东部沿海企业开拓了巨大的新兴市场,沿线国家主要为新兴经济体,为化解东部沿海地区的过剩产能提供了巨大空间。东部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

区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绿色经济质量不断提升,传统产业应向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实现产业空间梯次配置,利用区位优势、技术优势,承接发达国家的新科技、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技术吸收。逐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科技为支撑的创新体系,提高知识创新能力和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出口贸易中高技术产业产值所占的比重。依托“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发挥在海洋经济中与东盟各国的耦合作用。完善海洋经济空间布局,疏通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动阻碍。建设特色海洋产业小镇,创建省级海洋经济创新示范园区,促进海洋产业集聚发展,拓展与沿线国家在海洋资源开发、海洋产业合作、深海技术研究等多方面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2. 深化沿边试验区,培育开放新支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全面提高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水平”,沿边地区的开放是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沿边9个省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云南、西藏和广西)与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14个国家边境接壤,内陆边境线长达2.28万公里(黄伟新、龚新蜀,2014)。近年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世界各国之间贸易摩擦不断增多,我国对外贸易增量正由沿海向内陆沿边转移。在内陆地区,建立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先行先试、第四方物流、优势产品进出口价格指数;在沿边地区,开发边境口岸经济区、边境经济合作试验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将与周边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合作推向纵深发展。结合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和本地区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加强东北三省、内蒙古与俄罗斯和蒙古国等国家的经贸合作与技术交流,打造“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将甘肃打造成“连接欧亚大陆桥的战略通道”,将新疆打造成“向西开放门户”,以云南为核心打造“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以广西为核心打造“东盟合作高地”(雷小华,2013)。整合沿边地区优势资源、培育互市贸易规模由小变大、产品种类由单一向多元,加强与周边市场产业合作,逐步形成产业集群;沿边地区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跨境旅游和特色产品交易区;积极发展特色产业,承接沿海地区的出口产业转移,同时促进边境贸易向经济合作区转化升级。

3. 打造内陆城市群,完善开放新机制。内陆城市要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必须扬长避短、创造优势,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为契机,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贾继庆,2017)。积极承接境外和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产业转移,以内陆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依托,以经济开发区和产业聚集区为平台,发展高技术新型产业和高附加值商品的加工出口,承接高端制造业和高附加值的加工环节,开发园区是产业聚集的重要载体,应加快制定系统的园区布局规划,引导各地区各工业园区的发展方向,避免同质化,减少内耗,扩大差异化,发挥聚合倍增效应。加强综合保税区建设、完善综合保税区功能,逐步打造边检、检验检疫、海关、保税区一体化、全数据流对接,优化报检报关流程。

4. 推进“一带一路”,突破开放增长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点低,相比中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相对落后。虽然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支持下,经济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东部地区集聚效应强,西部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不断向中东部地区集聚,进一步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深入发展开放型经济,消除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大的制约瓶颈,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我国中西部地区开放步伐。“一带一路”建设拓展了西部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助推西部地区由对外开放的末梢变为前沿,向内、向外延伸了开放空间。“一带一路”建设重在通过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为扩大开放提供顶层设计和外围保障。其建设涵盖基础设施、贸易、投资、能源资源、金融、生态环保、人文等重要领域,将极大丰富开放内涵,夯实开放产业基础,拓展跨境经济合作空间(史本叶、程浩,2016;程艺等,2016)。依托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通过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网络,延伸产业链条,以沿线工业园区为平台,加速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以此实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加工区的分工与合作。

(二)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平台,提升全球物流通关能力

1. 深化自贸区建设,搭建对外投资合作平台。高水平对外开放主要内涵:由注重打破贸易壁垒转变为增强要素流动,由鼓励出口转变为优化出口结构同时重视进口,由注重引进和利用外资转变为鼓励对外投资同时优化对外投资结构,由商贸领域的广泛合作转变为对国内产业和区域发展需求的精准对接,由依赖多边贸易体制转变为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驱动等。因此,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搭建合作平台,完善相

关合作机制和渠道。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因地制宜建设若干自由贸易园区试点,发挥试点区的辐射作用,以点带面,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稳固推进中韩、中澳自由贸易区谈判成果,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推进中国与有关国家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建设进程,稳步推进中欧自由贸易区和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对外开放,形成促进投资和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以自贸区为核心,整合资源,以优惠税收和海关特殊监管政策为主要手段,建设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的对外投资合作平台。

2. 建设大口岸,优化大机场,推进大通关,构建大网络,以点带面,打造水陆空三位一体、点线面相结合的开放平台。完善口岸设施和管理;完善风险管理,为企业提供便捷服务;加强区域通关合作,提高跨区域通关效率;提高机场连接性,吸引外航参与,争取第五航权开放,加强陆空联运建设;建立空港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和信息共享平台,不断提升物流运作效率;依托机场,集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构建空港经济区产业体系。促进通关无纸化改革,提供“一站式”服务,提高“大通关”效率,打造集水、陆、空三位一体的“大物流”信息平台;推进口岸与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区港联动”、“区区联动”。建设多式联运服务体系和集疏运体系;依托铁路口岸建立现代化物流园区。构建口岸旅游线,积极申报过境免签,扩展入境旅游市场。

3. 深入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搭建科技互联平台、信息数据共享平台。在“一带一路”倡议引导下,搭建国内公共服务平台,完善与发改委开展的国际产能合作机制,促进信息对接、产业对接、项目对接和管理对接。充分利用与境外投资重点国别建立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搭建与重点国家和地区在装备制造、国际产能合作领域的平台制度化。发挥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牵线搭桥等多种形式的互联作用,包括政府高层互访、企业合作沟通、社会商贸组织及海外华侨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在科技合作领域,探索搭建科技互联平台、大数据共享平台、区块链跨国贸易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降低跨境支付成本、提高跨境支付效率,解决传统跨境支付体系成本高、时间长等难题。利用区块链底层协议搭建分布式交易平台,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智能业务匹配、辅助定价、跨语种联动等,逐步淘汰以广告竞价为核心的业务匹配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市场上广泛存在的诸如虚假广告、恶意差评、刷单等信息不对称问题。

(三) 加快现代金融体系建设和区域金融合作,创新金融服务监管工具,确保开放型经济稳速高质运行

金融合作一直是新兴经济体合作的薄弱环节,两次金融危机使亚洲的新兴经济体认识到,只有新兴国家联合起来才能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因此,发展开放型经济要通过金融合作,以金融一体化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积极推动金融体制改革,鼓励金融创新,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提高金融体系竞争力和风险防御能力,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才能满足不同发展阶段的实体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资金需求,提升实体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治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1. 拓宽金融服务范围。开展外汇改革试点,实行跨国公司本外币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制度。放宽跨境人民币和外币债券的审批与规模限制,开展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部分资本项目限额内可兑换试点,允许试点地区开展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业务。

2. 增强金融服务功能。推动金融机构发展贸易融资、内保外贷、外保内贷、外汇及人民币贷款、国际保理等综合金融服务,提升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水平和金融服务水平^③。充分发挥内引外联作用,提供覆盖境内外全链条的离、在岸一体化服务,提高离岸金融跨境结算便利度。

3. 完善开放型金融支撑体系。开放型经济呼唤开放型金融,建立开放型金融体系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关键突破口。借鉴发达国家金融改革经验,取消利率管制、放松金融市场的准入机制,完善境外投融资机制和股权结构,促进资本自由流动,为企业提供“外保内贷”的融资方式。发展境外投资基金,推进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设立和有效运作,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

4. 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和使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通过国际货币制度安排,提供全球通用的国际货币,既可以防止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又能节约交易成本,便利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实

现国际金融的有序发展。因此,中国必须尽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战略,促使人民币清算业务渗透进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和资本流动,使人民币成为区域性的功能货币。稳步开放金融市场,扩大本币结算,建立多边结算体系与货币互换网络,推进本币互换合作,进一步扩大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规模,支持跨国企业集团开展人民币资金集中运营业务。

5. 健全金融风险监管机制,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识别,完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机制,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探索建立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监管机制,加强对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和跨境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测,对企业跨境收支进行全面监测评价。

(四) 加快对外开放顶层设计、把握国际需求机遇,多措并举、推动开放型经济绿色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对外开放是系统工程,需要科学化、精细化设计,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是新常态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抉择,是对外开放战略的内在要求,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要有科学的理解维度和指标引领,才能最终实现对外开放由弱到强、由量到质、由低端到高端的转型升级。

1. 进一步通过行政力量推进开放度,改革市场体制,完善市场机制,加大与国际经济接轨,主动迎接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加快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构建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2. 努力提升中国出口产品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审时度势、抢抓机遇、量力而行,参与国际新技术竞争,加大国际性产业转移力度,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将对外开放与国内区域协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完善对外开放区域格局。

3. 做好开放战略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设计,重构新的有利于开放的制度体系:从全局的角度,对开放领域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目标,推动开放型经济绿色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施建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商学院;夏传信,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大数据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赵青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卢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责任编辑:闫妍)

注释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②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大连瀚文咨询有限公司《2018“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年5月)。

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2015年9月17日)。

参考文献

- (1) Grossman, G. M. and E. Helpman, 1991,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2) Lucas, Robert E., Jr., 2009, “Trade and the Diffusion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 1(1), pp.1~25.
- (3) 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
- (4) 蔡昉、王美艳:《中国面对的收入差距现实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 (5) 成思危:《虚拟经济五特性》,《电力技术经济》,1999年第4期。
- (6) 成思危:《虚拟经济的特性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31期。
- (7) 程艺、刘慧、公丕萍、宋涛:《中国边境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经济地理》,2016年第9期。
- (8) 程文、张建华:《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自主创新——兼论“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与跨越》,《经济研究》,2018年第4期。
- (9) 黄伟新、龚新蜀:《我国沿边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14年第1期。
- (10) 贾继庆:《内陆城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研究》,湖北省社会科学院,2017年。
- (11) 雷小华:《中国沿海沿边内陆地区构建对东盟开放型经济分析——以广东、广西、云南、四川为例》,《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3期。
- (12) 全毅:《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外开放理论创新与发展》,《经济学家》,2018年第11期。
- (13) 宋泓:《中国是否到了全面推进开放型经济的新阶段?》,《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4期。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in China

..... Tang Zihui, Mao Pei and Zhao Jinlong

The Channel Analysis of Credit Policy Affecting Loan Decision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Wang Dan

Financing Constraints, Financial Marketization and Corporate Export Behavior..... Zhang Shikun

Development Trend and Strategic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 Fan Zhongbao, Wang Xiaoyan and Ruan Jian

The Realistic Path Choice of Urban Haze 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NormalFu Peng

Structural Convergence and the Innovation Incentive Effect of “Advantageous Enterprise Support” Policy

..... Luo Xiaohui, Hu Longying and Wan Congying

Research on Service Innov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Based on User Demand Chain

..... Chen Yun, He Yuanqiong and Zhou Qi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mediary Service Mechanism of B2B E-commerce Credit Information in China Chen Hua

Understanding and Thinking o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awei Enterprises..... Liu Pingqing and Wu Anze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ollaborative Model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Cross-border Logistics Compound System Zhang Xiaoheng and Zhang Ronggang

ABSTRACTS OF SELECTED ARTICLES

Challenges and Innovations Faced by China's Open Economy

Shi Jianjun and other autho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40 years ago,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has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In general, in the first 30 year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hina's income gap continuously expanded, which was affected by the imperfect economic system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choices and changes in government policies. In the latest 10 years, some factors that narrowed the income gap have become more apparent, curbing the momentum of the continuous widening of the income gap, and the stage of small fluctuations and high levels of income gap.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 reform of 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is complicated and arduous. In the next 10 years, only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firmly, quickly and industriously can achieve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Government Innovation Preferences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Li Zheng and Yang Siying

As a system arrangement to adjust the financial author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largely determines the way, efficiency and level of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3 to 2015,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ses the influenc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region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rough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method and the panel simultaneous equ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mproves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but also inhibits the government's innovation preference, which leads to the lack of the role of "tangible hands" in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the loss of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terms of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an still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regional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sub regional survey,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concealment effect of government inno-